

论 社会经济科技 协调发展

李泊溪 岳颂东 主编

新华出版社

论 社会经济科技 协调发展

李泊溪 岳颂东 主编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10号

论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

李泊溪 岳颂东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76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插页2张 140,000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949—X/Z·227 定价：4.40元

序　　言

马　洪

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及其驾驭自然和社会能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类追求自身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根本的内在的动力，而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意义也正是在于此。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没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物质基础；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质的飞跃，社会也不会有明显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中的“第一生产力”；没有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没有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要受到制约。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能进步，人类就能发展；否则，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就要受到阻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将振兴经

济作为其首要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任务。为了振兴经济，这些国家采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不少国家并没有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尽管它们的经济都曾有过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并没有消除大面积的贫困现象，而且还产生了人口膨胀、失业、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引起的许多严重问题。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了政治、经济体制各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增长”，没能处理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脱节现象，结果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下去。建国四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加强，城乡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水平得到了提高，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从总体上和总的趋势上说，我国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相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比较协调的。但是，我国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也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的因素和方面。这些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一）国民经济波动频繁，波动幅度大；（二）产业结构不协调；（三）经济总量供给与需求不协调；（四）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不协调；（五）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六）收入分配关系不协调；（七）生态环境、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八）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九）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不协调；（十一）社会经济生活中多重二元结构并存形成的不协调，诸多不协调妨碍了我国经济实现的良性发展。

90年代，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今后十年，能否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重视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以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纵观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大体有两种类型，节资源型和耗资源型。后一种是以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的经济增长。我国的资源赋予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有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诚然，我国有些资源的赋予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资源赋予量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我们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具有如下特征：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节能、节原的适用技术体系。简言之，我们必须走使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个计划纲要》也把“坚定不移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

工作的中心”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事实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我国国家整体发展的指导思想。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协调，离开了协调，便谈不上持续与稳定。协调的内容是多层次的，而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是高层次的协调，对国家的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若要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全党、全国人民首先必须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要认识到，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子孙万代永远幸福的需要。另外，要建立综合的系统的政策体系，为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上与法律上的保障。

《论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一书，提出了社会、经济、科技协调的概念，论证了三者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指出了我国要实现三者协调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使三者协调发展的对策。

这本书的出版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对社会、经济、科技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有参考价值。

本书各章作者

总 论	李泊溪 岳颂东
第一 章	何桂林
第二 章	庞振月
第三 章	岳颂东
第四 章	岳颂东
第五 章	岳颂东
第六 章	李泊溪
第七 章	岳颂东 高振刚 谢伏瞻
第八 章	岳颂东
第九 章	张 �煌 刘伟林 岳颂东
第十 章	岳颂东
第十一 章	王宏波 等

目 录

总 论 论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	1
第一章 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概念	43
一、一个引起世界关注的新课题	43
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概念	48
三、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战略观	54
第二章 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研究	
领域	60
一、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特点	60
二、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研究领域	66
第三章 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71
一、实施产业政策，促进体制改革	72
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失调与震荡	75
三、经济失调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83
四、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	88

第四章 经济依靠科技 科技面向经济	93
一、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	93
二、科技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表现	96
三、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01
第五章 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107
一、社会发展的涵义和内容	107
二、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112
三、科技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	115
第六章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分析	121
一、改革以来地区发展政策的回顾	121
二、区域发展政策效果分析	126
三、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33
第七章 协调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140
一、中国人口状况与人口形势分析	141
二、中国自然资源现状与资源形势分析	146
三、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与前景预测	150
四、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53
第八章 协调发展与改革开放	161
一、协调发展与全面改革	161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	167
三、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171
第九章 协调发展与宏观决策	176
一、协调发展标准的确定势在必行	176
二、多元行为主体对协调发展的制约	179
三、监督系统对宏观决策的影响	183
四、决策者与咨询决策	184
第十章 建立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196
一、建立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196
二、建立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	202
三、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206
第十一章 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	211
一、协调发展指标的形式、类型和设计要求	211
二、建立指标的思路与大系统协调关系的 分析	215
后记	225

总 论

论社会、经济、科技 协调发展

在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问题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来的。在1981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委《关于我国科技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曾明确地指出，科技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1982年，在由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中，又把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作为我国奔向2000年的总体发展战略，并且取得了研究成果。1986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全国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模式》研究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科研课题正式立项加以研究。在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更加明确地重申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执行“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战略，因此，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已开始成为全党、全国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共

识，各级领导干部在决策和部署工作的实践中，也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必须把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摄入自己的决策视野，成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归宿。

一、提出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这一命题的提出绝非偶然。纵览世界，通观全国，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得到说明。

1. 全球发展战略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源地，逐步扩展，兴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在60年代以后，这种研究形成了很大热潮。针对全球问题和世界发展战略，世界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观点和模式。

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一点上得到共识，这就是最近二十年来，由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大大增强了人类把握自然的能力，同时人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又酿成了许多影响世界未来的社会问题。这样科技与经济、社会问题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如人口爆炸、现实和潜在的资源匮乏，难以控制的城市扩展，利用先进技术进行犯罪，毒品和恶性疾病的泛滥，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霸权主义造成的地区军事冲突。每一个问题都与其它问题紧密相连，解决问题时常出现两难境地。因此很难采取传统的办法直线地处理问题；相反，要应用系统的方法协调地解决科技、经济、社会问题。所谓世界上带有全球性战略问题的“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有相当的部分是需要通过协调的战略去解决。

2. 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历史教训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起初单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的发展，其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生活与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发展已大相径庭。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关键是克服国民经济的停滞状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只要经济高速增长，就会自行产生“淋下效应”，施惠于全体国民，相应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并没有实现经济学家设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事实是，有些国家大都实现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甚至超过了联合国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6%的指标，可是经济增长并没有自行产生“淋下效应”，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日趋贫富两极分化，人口、就业、住房拥挤、交通不畅、饥饿贫困诸种社会问题更加恶化，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的状况。有些国家连增长也维持不了。发展战略选择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必须从整体和全局的高度推行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战略。

3. 世界新技术革命引起的巨大变革

20世纪5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猛烈地冲击着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其来势之猛、波及之广、影响之深是历次产业革命所不可比

拟的。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和科技活动的范围大大扩展了。经济活动不再是简单的“原料→生产→销售”，而是包括“确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生产与发展规划→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社会化大生产→全面的市场服务→物质和文化的消费→人的全面发展”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活动，经济本身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科技领域和社会领域。科学和技术活动，也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范围，科学的各个学科向微观方向越分越细，向宏观方向相互汇流；使各学科的界限融合，科技向经济和社会领域也广泛渗透，形成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技术商品化。总之，经济、科学与社会相互交叉、相互兼容。这样，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技，必须按照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的要求提出科技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科技、社会三者的内在结构和运动规律，分析它们的交叉效应，相互结合的内在依据和相互促进的动力和条件。这样协调发展不是单项的孤立的发展，而是最合理的结构配置和最优化的发展，三者不是拼盘式的机械汇集，而是在战略方针指导下构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发展活体。

4. 我国发展战略研究的深入探索

回顾我国关于发展战略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到打倒“四人帮”时期。那时我国基本上是模仿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国民经济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当然，我们也取得了

不小的成绩，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盲目追求高速度，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科技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资源浪费比较严重，人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如1953年至1980年的28年中，国民收入增加了4倍，而居民消费水平只提高了1倍。1958年提出“十五年内要赶上英国”，貌似战略性跃进，实则历史性失误。10年动乱中，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则更是我国发展过程的历史性灾难。

第二阶段，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由于我党刚刚粉碎“四人帮”，急于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宏观决策过程中，高估了我们的国力，低估了10年动乱造成巨大损失，对各方面的积重难返估计不足。因此提出了一些超越国力的战略目标，诸如“建设十来个大庆”，不适当当地重复引进了一系列大型成套设备，一度产生了“洋跃进”，企图继续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建设，继续忽视经济与科技、社会的协调发展，结果国民经济被迫大规模地调整。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一阶段，全党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完成了党在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和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经过八十年代的努力，取得了“翻一番”和人民基本实现温饱部分地区开始进入小康的巨大成就。为了贯彻十二大的战略方针，各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各市、县乃至部分乡镇都进行了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掀起了空前的“发展战略热”。如此普遍地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在我国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它对促进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一类发展战略基本上还是“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各地大同小异，模式雷同。尽管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同时，着重强调了提高经济效益和实现小康生活水平两个条件，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某些领导者往往用“翻番”的产值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准。自1984年下半年以来，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翻番热，热衷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追求产值，用高投入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的需要，经济效益不高。虽然有的地方产值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两位数的百分点，但人民日常生活应当急迫解决的许多困难未得缓解，经济与科技、社会中的许多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失调现象。

第四阶段，从十三届五中全会至1992年春节。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当贯彻“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战略，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重申“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建议》指出：“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我国四十一年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体现，全党同志务必时刻牢记，任何时候也不能偏离，努力避免经济生活中再次发生大的波折”。